

世變下的史筆：《當世新話》初探

柯混瀚*

摘 要

今題為藤井淑編《當世新話》（初編）乃日本明治漢文小說集之一，實為著名漢學家依田學海（1834~1909）自作自評，於明治八年（1875）五月刊行。《當世新話》共收錄異聞瑣事三十三則，其「新」在於題材源自新聞，強調記事之「真實性」與「即時性」，並與日本近代報刊發展之背景，緊密聯繫。是書作者採用「筆記體」形式，承襲中國「稗史」傳統之精神，記錄當代世相，並有所寄寓，足以呈現明治維新以來，部分逡巡於新舊時代、東西文化間的文人姿態。循此，本文首先針對《當世新話》之成書背景，鎖定於明治初期新聞業勃興與漢文小說創作之互動，有所略述。其次，以中國古典小說為參照，歸納、剖析其內容特徵與史傳表現，並試從日本漢文小說發展之脈絡，進一步探究《當世新話》書寫之相關特色與意涵。

關鍵詞：《當世新話》、新聞、史筆、日本漢文小說、明治時期

* 洛陽師範學院文學院古典文獻學教研室講師。

Historical Writing Skill in Changing Era: A Primary Study on *Dangshi xinhua*

Ko, Hun-Han*

Abstract

Published on May, Meiji 8 (1885), *Dangshi Xinhua*, compiled by Fujii Shuku and actually written by famous sinologist, Gakkai Yoda (1834-1909), is one of the Japanese Chinese-character novels in Meiji era. As collecting 33 anecdotes, *Dangshi xinhua*'s creativity can be defined by its relation to the developmental background of modern Japanese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in which both characteristics of "authenticity" and "instantaneity" are emphasized. Besides,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anecdote," the book makes records, with some hidden messages, of the author's time, appearing what intellectuals aimed to express among old/new generations and east/west cultures after Meiji restoration.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ackground of *Dangshi Xinhua*, argu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rosperity of journalism in early Meiji era and creative writing of Chinese-character novels. This paper,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s of the significances and historical style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also focuses on, in the context of Japanese Chinese-character novels, the writing features and implications of *Dangshi Xinhua*.

Keywords: *Dangshi xinhua*, Journalism, Historical Writing Skills, Japanese Chinese-character Novels, Meiji Era

* Lecturer, College of Liberal Art,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世變下的史筆：《當世新話》初探

柯混瀚

一、前言

今題為藤井淑編《當世新話》(初編)(下文均簡稱為《當世新話》)乃日本明治時期漢文小說集，其中收錄異聞瑣事三十三則，最長者千餘字，最短者僅百餘字，每則均有整齊的四言題名。書前有半醉居士〈當世新話序〉，正文每半葉十行，行廿字，並由著名漢學家依田學海(1834~1909)¹負責評點，評點形式為眉批²，於明治八年(1875)五月由東京奎章閣發兌。又(初篇)書末版權頁雖題有「《當世新話》次編近刻」，然經筆者查詢日本國會圖書館「国立国会図書館サーチ」與日本國立情報學研究所「CiNii Books」等網路工具，皆未能查獲(次編)的訊息，推測可能如同近藤元弘(1847~1896)³所編《日本虞初新志》，因銷路不廣，或另有他故而未續刊。⁴

雖然《當世新話》於明治漢文小說中，並非鴻篇巨制，卻有其不容忽視的特殊性。關鍵在於此書「根據當時新聞報導，據實直敘，隨聞即錄，將閭巷之瑣事，遠境之信報，忠義節烈之行，可為楷模鑒戒者，悉數網羅」⁵，即取材自當時的新

¹ 下總佐倉(今千葉縣)人，幼名幸造，長名朝宗，字百川，號學海，為明治時期著名之漢學家、文人、劇作家，著有漢文小說《譚海》四卷、《談叢》二卷。

² 按：原書正文中眉批皆未署名，然由封面題有「藤井淑編／依田百川評」，故可推斷為一人所評。

³ 字仲毅，號南崧，伊豫人(今愛媛縣)。父親近藤元良(1800~1868，號名洲)為江戸後期之心學家，傳授由石田梅巖(1685~1744)所創立之石門心學，且有兄名元脩(1839~1901，號南洋)，與弟名元粹(1850~1922，號南州)，以詩文、治學與授業而聞名，時人稱為「近藤三兄弟」。除編有漢文小說《日本虞初新志》二卷外，另著有《南崧詩稿》、《詩文稿本》、《人の道》。

⁴ 王三慶等編：《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第1冊，〈《日本虞初新志》中文出版說明〉，頁137。

⁵ 王三慶：〈日本漢文小說研究初稿〉，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域外漢文小說論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頁10。

聞報刊。有鑑於王三慶論及明治漢文小說之特色，指出其「具備史傳文學的寫實精神與新聞題材」⁶，而《當世新話》正屬其例，卻鮮少為學界所關注。⁷因此，本文首先針對《當世新話》之成書背景，鎖定於明治初期新聞業勃興與漢文小說創作之互動，有所略述。其次，以中國古典小說為參照，歸納、剖析其內容特徵與史傳表現，並試從日本漢文小說發展之脈絡，進一步探究《當世新話》書寫之相關特色與意涵。

二、《當世新話》之成書背景

日本漢文小說創作之風潮，直至明治時期，仍然持續不衰，自然有其時代背景的因緣。針對日本近世（江戶時代）以來漢文小說的發展，如王三慶所言：「若從小說方面來看，則以近世中後期居多；其次則是從明治初期到甲午戰爭之前的近代，也還能有所續接，隨後漢文的寫作便稀稀落落而難得一見了。就這點來看，在維新之後，漢文的地位顯然江河日下，不再是知識份子的優先選擇，初期還有一些經歷近世的學者勉力支撐與過渡，有如刺鳥般唱出淒艷的叫聲，然後告一段落。」⁸換言之，自 1894 年（清光緒二十年、明治二十七年）甲午戰爭（日方稱為「日清戰爭」）爆發以前，日本致力於維新圖強，舉國向西洋文明學習，而代表傳統漢學的漢文小說，仍在承繼江戶漢文小說與諸多條件的配合下，於文壇上綻放最後的光芒。其中條件之一即為出版事業的繁榮，尤其是近代報紙、文學雜誌的興起，即在客觀條件上，為作者提供更多元且便捷的知識、訊息，以及更寬廣的創作園地。⁹

⁶ 王三慶：〈明治時期的漢文小說〉，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編印：《文學絲路——中華文化與世界漢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世界華文作家協會，1998 年），頁 127。

⁷ 就筆者檢索所及，目前似僅有孫虎堂《日本漢文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於〈第二章 筆記體日本漢文小說〉中以三頁餘的篇幅，專門進行述評。

⁸ 王三慶：〈日本近世漢文小說之出版研究〉，〔日〕磯部彰編：《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ほしづくよ》（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アジア・アフリカ學術基盤形成事業「東アジア出版文化國際研究據點形成及びアジア研究者育成事業」チーム，2010 年），頁 313。

⁹ 針對「明治漢文小說發展之背景」，筆者曾有所析論，歸結為「江戶漢學之餘緒」、「漢學私塾之開設」、「出版事業之繁榮」、「文學社團之互動」、「中日文人之交流」等五點，在此僅從《當世新話》之創作與近代報刊勃興的關係上，進行論述。可參拙著：《日本明治時期漢文小說書寫之漢學淵源——以文言小說為例》（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 年），頁 13-27。

維新以來，基於文明開化的原則，尤以明治二年（1869）公告「新聞紙印行條例」後，報紙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如明治三年（1870）十二月十二日發行之《橫濱每日新聞》（係日本最早的日刊報紙），明治四年（1871）之《新聞雜誌》，明治五年（1872）之《東京日日新聞》、《日新真事誌》、《郵便報知新聞》，明治七年（1874）之《朝野新聞》、《讀賣新聞》，以及明治十二年（1879）之《大阪朝日新聞》等等，不一而足。當中，不乏新聞報紙設有專欄，聘請著名文人擔任主筆，接受漢文學創作的投稿，而《朝野新聞》社長成島柳北即首開風氣，設立「雜話」、「雜錄」的專欄（相當於今日報紙中的文化欄），親自審稿，並主持評論。¹⁰在此，近代報刊的發達，意味著資訊、知識的快速流通，不僅為作家提供創作靈感或素材，或是發表作品的園地，書商亦藉由刊載廣告，公告出版、預購的訊息，成為漢文小說傳播與接受的新途徑。¹¹

關於日本近代報刊的成立，漢文小說家服部撫松（1841~1908）¹²《東京新繁昌記》（初編）「新聞社」中有如此描述：

社內列高机數箇而分其課，各要其神速，有奔走于東西探新奇者，有出于院省寫公布者，有編文章者，有植活字者。明日所出新聞，今日至午後四、五時間已成。其簡便也，有一器械而摺數千紙，速于菓舖丁稚燒煎餅。一枚值不出于四、五錢，若括一月買之，則自社配布之，且減其值，一月間五十錢乃至七十五錢也。以藝妓一纏頭知世界新事，不亦廉價乎？紙上所載概畧，則政府之布告、海外之新事、國土之豐歉、物價之高低、貿易之盛衰、開店之報告，或絃妓之醜美，或戶長之勤惰，凡入耳觸目新

¹⁰ [日]前田愛：《幕末・維新时期文學 成島柳北》（《前田愛著作集》第1卷）（東京：筑摩書房，1989年），頁445、446。

¹¹ 今檢索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明治期出版広告データベース」的電子資料庫，可知明治時期新聞報紙中漢文小說的出版廣告，往往是書肆宣傳其各類出版物，以和文簡介此書，並提供預購的途徑，如明治十五年（1882）年一月十三日《大阪朝日新聞》宣傳近藤元弘所編《日本虞初新志》，明治十六年（1883）十一月十七日之《東京日日新聞》宣傳菊池三溪《本朝虞初新誌》，明治十七年（1884）八月十八日之《東京日日新聞》宣傳依田學海《譚海》。

¹² 名誠一，號撫松，原為二本松藩藩學教授，維新後主要以著述為業，長於漢文，創立出版社「九春社」，先後發行情學雜誌《東京新誌》、《春野草誌》與《吾妻新誌》，著有漢文小說《東京新繁昌記》、《東京柳巷新史》。其暢銷作為《東京新繁昌記》，問世後洛陽紙貴，並以版稅收入於湯島建造豪宅，號為吸霞樓。

事，不問貴賤，必記載之。¹³

從上文可知明治初期新聞社有所分工，且有器械協助，訂購整月亦有折扣，而所載內容「凡入耳觸目新事，不問貴賤，必記載之」，拜新聞業發達之賜，誠可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明治以來隨著維新事業的勃蓬發展，新文明、新事物、新名詞等的輸入與學習，政治、經濟、軍事、學術、生活、習俗等各方面，均有所轉變，如此萬象更新的態勢，自然引發作家的關注。再者，活躍於明治初期的漢文小說家，原在幕末，多身為幕臣、儒官或藩士，在「版籍奉還」後，成為一群「失業」的知識分子。其中部分人投入新聞業，具有報人身分，兼而創作漢文學，如成島柳北、服部撫松、三木愛花（1861~1933）¹⁴等皆是。在上述時空背景下，出現不少取材自新聞時事的漢文小說，形成創作上的一大特色。

如明治九年（1876）高橋阿傳的強盜殺人案件，震驚社會，喧騰一時，當時如《郵便報知新聞》、《東京曙新聞》、《讀賣新聞》、《假名讀新聞》等皆曾報導。¹⁵而菊池三溪（1819~1891）¹⁶《本朝虞初新誌·臙脂虎傳》即改寫自此事件，本篇題名下有雙行夾註：「一名〈毒婦高橋男傳實錄〉」，且篇首云：「距今茲明治壬午六年前，以八月二十六日之夜，暗殺後藤吉藏于淺草御庫前丸竹三四郎樓上，毒婦男傳之事行，各社新報爭記載之。而其本末紛紜，一是一非，不知其誰適從焉。獨十年八月十日，警視分署之法庭，男傳所自首，頗為明確。予乃絕長補短，省

¹³ [日]服部誠一：《東京新繁昌記》（初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明治七年東京奎章閣本），頁15b-16a。

¹⁴ 名貞一，字愛花，號愛花情仙、愛花情史、愛花仙史、紅樓夢主人等。上總（今神奈川縣）人，曾隨名儒田中從吾軒（1827~1894）習漢學，又入服部撫松門下，為活躍於明治、大正年間的文人、記者，著有漢文小說《新橋八景佳話》、《情天比翼緣》。

¹⁵ 明治毒婦高橋阿傳於明治十二年（1879）一月因強盜殺人之罪，遭受斬首之刑。其死後，出現改編自此奇聞之文學作品，如東京新富座曾上演歌舞伎作家河竹默阿彌（1816~1893）之《綴合於傳假名書》，而其代表作當屬通俗小說家假名垣魯文（1829~1894）之《高橋阿傳夜刀譚》（1879年4月刊行）。

¹⁶ 名純，字子顯，通稱純太郎，號三溪居士、晴雪樓主人，生於文政二年（1819），卒於明治二十四年（1891）。師承名儒林檎宇（1793~1847），曾任紀伊藩藩儒、第十四代將軍家茂之侍講，維新後主要潛心於著述，善詩能文，最長於稗官野史，著有漢文小說《西京傳新記》（初~四編）、《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誌》三卷、《譯準綺語》一冊。

繁摘要，名曰〈臙脂虎傳〉¹⁷，可知作者於明治十五年（壬午，1882）將昔日要聞以傳記形式改寫。又呼應此篇而作之依田學海《譚海·阿傳偽供》，亦於篇首曰：「友人菊池子顯作傳著其始末，余嘗閱新聞紙，讀其偽供，情事實穿，有發端，有結局，殆是一部傳奇小說，今試敘列如左，亦見其非尋常女盜也。」¹⁸如此寫作因緣或題材可能源自新聞報刊者，另有《本朝虞初新誌》之〈俳優尾上多見藏傳〉、〈割雞刀〉與《譚海》之〈橫濱貞婦〉、〈征蕃紀勳〉、〈使韓締約〉以及《談叢》之〈磬梯山噴火記〉等篇，共同見證新時代、新型態的來臨。

最末，附帶一提《當世新話》的作者問題。本書雖題為「藤井淑編」，然其生平事略不詳，而經筆者檢索所及，得知另有題為「藤井淑編」之和文典籍——《近來支那新報》於明治八年（1875）一月刊行。其實，若以半醉居士〈當世新話序〉所言「秋風道人素嗜稗史小說，罷官家居數年，著書自娛，頃有《當世新話》之著，以余同儕也，偶見出示，且索之序」¹⁹，則作者應為「秋風道人」。雖說明治年間，有以「秋風道人」為雅號之政治小說家內村義城，著有《鶯宿梅》（1887）與《廿三年夢幻之鐘》（1887），但其為《當世新話》作者的可能性頗低。近有高橋昭男推斷秋風道人可能是成島柳北²⁰的化名，即假託為他人所作。²¹然而，據楊爽進一步查考，足以斷定「秋風道人」為依田學海，「藤井淑」乃其荊妻之名，而《當世新話》實為學海自作自評並借荊妻之名出版的漢文小說集。²²如此一來，

¹⁷ 王三慶等主編：《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第1冊，頁374。

¹⁸ 王三慶等主編：《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第2冊，頁231。

¹⁹ 王三慶等主編：《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第1冊，頁103。又按：下文所引《當世新話》之原文或批語，皆據此書，僅於文末註明題名、頁數，不另贅註。

²⁰ 成島柳北，江戶（今東京都）人，名弘，字保民，通稱甲子太郎，號柳北。生於幕末天保八年（1837），卒於明治十七年（1884），原為著名幕儒，曾任將軍侍講，維新後則以文人、記者之姿活躍於文壇，多以灑上漁史、何有仙史之號，於其主持之《花月新誌》發表作品。今有漢文小說《柳橋新誌》（初～二編）傳世。

²¹ 高橋昭男於考究「灑上漁史戲稿、秋風道人漫評」之《新柳情譜》（連載於《花月新誌》）時，論及「秋風道人」的真實身分，指出難以比對為哪位同道作家。又因《花月新誌》另可見「秋風道人編、半醉居士評」之《新橋佳話》與「秋風道人編」之《七湯清話》，而能如此深入描寫新橋花街並愛好溫泉者，故主張不能排除秋風道人為成島柳北之可能。詳參〔日〕高橋昭男：《〈新柳情譜〉——成島柳北の風流韻事》，《成蹊國文》第49號（2016年3月），頁93、94。

²² 楊爽從署名「丙戌四月秋風道人題於墨水精廬」之〈情世界序〉（即服部撫松《東京柳巷新史》之他序）的印鑑，並參照《花月新誌》、《學海日記》、《親類書》等文獻，論證秋風道人應為依田學海，「藤井淑」乃其荊妻之名，而半醉居士則難以確考。詳見楊爽：〈漢文白話體小說の書き手「秋風道人」とは誰か：依田學海の創作活動の一面〉，

以「秋風道人」為名發表於明治初期著名文學雜誌——《花月新誌》²³上的《新橋佳話》(章回體漢文小說)與《七湯清話》，皆應成於學海之手，並改寫世人對其著作的認知。

三、《當世新話》之內容特徵

日本漢文小說乃日人以其深厚的漢學素養，尤其是在中國古典小說的影響下，甚或追蹤、模仿某類或某部中國古典小說，使用漢文書寫的敘事文學作品，並反映其情感思想與時代精神，可謂和(日本)、漢(中國)文化交融下的珍貴遺產。誠然，做為明治漢文小說的《當世新話》，自然在各方面深受中國古典小說的影響，故下文即立足於時代脈絡中，嘗試分析其題材內容的特點。

(一) 源自新聞之世相

之所以認定《當世新話》取材自新聞，實因〈當世新話序〉曾言：

然稗史小說之體有二：其一則架空設事，假造人物；或烈士報讎，孝子尋親；或男女求婚，惡漢殺人，言語行事，首尾呈露，模寫逼真，妙則妙矣，然要不過戲玩之具也。其一則據實直敘，隨聞即錄，雖不無一二粉飾，要是眼前實事，顧但龐雜濫沓，或失於訛傳，或過於浮誇，若有識者參伍考證，取其瑜而去其瑕，舉其可信，而舍其可疑，未必不為察風觀俗之一助也。曩者有曲亭、柳亭輩，奇才飄逸，文辭巧麗，能為架空之談，世爭傳焉。倣輩之徒，不絕於時，而近者人亦稍厭之，蓋以其無補於事也。獨至新聞紙則不然，閭巷之瑣事，遠境之信報，莫不登錄焉。即至孝義節烈之行，必審其顛末，證其事實，所謂據實直敘者也。(頁 103)

在此，半醉居士提出「稗史小說之體有二」，意在稱揚秋風道人之創舉，即取材自

《二松學舍大學人文論叢》第 99 輯(2017 年 10 月)，頁 138-151。

²³ 《花月新誌》為明治初期著名的文學雜誌，刊載漢文、漢詩、和歌、俳諧、隨筆、紀行，乃至於古典文學之漢譯、西歐文學之譯作等，範圍極廣，其中不乏當代鴻儒碩學、文人墨客的投稿，由時任《朝野新聞》社長的成島柳北主持，自明治十年(1878)一月至明治十七年(1884)十月，八年間共發行 155 號。

新聞報刊，班班可考，深得史家「審其顛末，證其事實，據實直敘」的精神，有別於近世以來如曲亭馬琴（1767~1848）、柳亭種彥（1783~1842）之輩「架空設事，假造人物」，即使「模寫逼真」卻淪為「戲玩之具」的通俗小說，強調《當世新話》載錄「眼前實事」且可為「察風觀俗之一助」的實用價值。

再者，《當世新話》的命名，從「當世」一詞與「新」字而言，實與新聞報刊的即時性、當下性，即強調今下發生的奇聞逸事，緊密聯繫。以《當世新話》出版於明治八年五月，而半醉居士〈當世新話序〉題於明治七年十二月，故最遲成書於此時。又書中各則記事多稱「本年」，如〈第一 橋氏計法〉題名下有雙行夾註曰：「以下稱本年者，係明治七年」（第1冊，頁107），而檢視書中各則明載年代者，最早為明治六年（1873），推斷作者主要是根據明治六、七年間新聞時事，在較短的時間內，以漢文改寫而成。

此外，作者於記事中敘及代表開化事物的「新聞紙」，亦可旁證此書與報刊文化的關連，如〈第一 橋氏計法〉：

橋瓜（按：應為「橋爪氏」是）幸昌外債賠償法載在諸家新聞，天下莫不稱嘆，然或疑其矯飾詭激，未必出真情。頃及得幸昌家計支消法，決知其不然，錄左示天下有心之人。

幸昌母子營生所獲每月金六圓，支消金三圓飯價、一圓二朱屋賃、一分買飲水、二朱浴錢、一分買新聞紙、二朱供祭戊辰戰亡、二朱蓄積豫備、二分供舊主煙價、二分償外債。（頁107）

上文所謂「橋爪幸昌外債賠償法載在諸家新聞」，應是指明治六年（1873）由青森縣士族橋爪幸昌向政府提出的上書，意欲號召民眾透過捐獻，解決國家的外債問題，可謂愛國義舉，故學海批曰：「此實第一美談，不可不載。」（頁107）其中「一分買新聞紙」，列入幸昌家計支消法的每月必需品，可見報刊的廣為傳播與漸受重視。

另有〈第十 樟腦殺蛹〉記養蠶達人鈴木重晴從報紙獲得新知，精進其製絲技術：

有若松縣鈴木重晴者，夙以養蠶製絲著，曾讀日報社新聞，得佛國籠生繭，送一所，插以樟腦，不想繭中所存蛹皆死，遂為良繭事。謂：「這事果實，除害得利，其益不細。」謀之同儕，皆笑為虛妄。重晴自信不疑，買樟腦十二錢五厘，分裹做八貼，置衣笥內四隅，分生繭八升，每笥四升，閉鎖十有五日，把繭截斷分開，蛹皆枯死久矣。試二三個皆然，素質不變，較之曝乾繰紡殊易，八升繭得量百六十錢，蠶絲潔白，光艷異常，人皆驚以為良法。因並繭五、製絲一包，進呈內務省。（第1冊，頁115）

鈴木氏從「日報社新聞」得知利用樟腦殺死蠶蛹之良法，以此試驗，果真成功，「較之曝乾繰紡殊易」，且未減損質量。對此，學海評曰：「如此讀去，一片紙頁，大有洪益」（頁115），極為讚譽新聞紙「廣開民智」的啟蒙作用。

雖說《當世新話》取材自新聞紙，由孫虎堂歸入「筆記體異聞類小說集」，但報刊所載各類訊息繁多，如《東京新繁昌記》所謂「紙上所載概畧，則政府之布告、海外之新事、國土之豐歉、物價之高低、貿易之盛衰、開店之報告，或絃妓之醜美，或戶長之勤惰」云云，而檢視全書三十三則逸事，卻罕見涉及朝政軍國、中上層階級者。故事主人公多為庶民百姓，誠如半醉居士所謂「孝子貞婦義僕節婢之逸事」，如有〈第五 陸中孝子〉、〈第六 愚孝索死〉、〈第十四 孝女守家〉、〈第二十一 節婦殉義〉等篇；與「劇盜騙拐妓女俳優之情狀」，如有〈第九 騙盜裝官〉、〈第十一 警者謀奸〉、〈第十五 貞妓全產〉、〈第三十一 騙拐奇術〉、〈第三十二 賊妓攫金〉、〈第三十三 囤貨賺金〉等篇，想必是小說作者的有意為之。大抵而言，其題材內容主要記敘當時的風土民情、鄉里美談與社會新聞，確實為「閭巷之瑣事」（《當世新話序》），具有濃厚的世俗化色彩。

以明治漢文小說而言，由於經歷幕末以來的政治動盪與重大變革，小說家傾向於書寫當代歷史人事，可謂整體趨勢。如依田學海《譚海》中不乏記述藩府官吏、儒者文士的生平事略或事涉對外交戰者，而相較之下，其《當世新話》更傾向於記述庶民百姓，題材類型與關注層面不盡相同。

（二）逡巡於新舊之間

半醉居士有云：

秋風道人素嗜稗史小說，罷官家居數年，著書自娛，頃有《當世新話》之著，……嗚呼！近者政治之行，速於置郵傳命，美事蹊跡，層見疊出，讀官撰之史，可以識事業之盛、功績之宏矣。然吾聞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此書雖一小冊子，亦風俗之所關，治忽之所繫，未可等閒看過也。（頁 104）

上文以《當世新話》「雖一小冊子」，乃秋風道人罷官在家的「消閒自娛」之作，不如官撰之史足以「識事業之盛、功績之宏」，但仍是「風俗之所關，治忽之所繫，未可等閒看過」，而如此言論，也並未跳脫中國稗史小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寓勸誡、廣見聞、資考證」等觀念的範疇。

基於此，孫虎堂以為《當世新話》的創作主旨，不脫自娛與勸懲的窠臼，而與之相對，將其題材分為兩類：一類寫世間奇人、奇事、奇俗、奇案，反映文人的嗜奇心態；一類寫孝子貞婦義僕節婢的逸事，反映作者宣揚忠、孝、節、義思想的心態。²⁴不過，所謂「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文心·時序》語），明治以降，新文明、新觀念的衝擊下，以及社會型態的改變，自然會反映於文學創作上，漢文小說亦不例外。據此，筆者以為此書大半篇章雖然承襲江戶漢文小說張揚倫理而寓以勸懲的傳統（當然不可諱言此傳統可追溯至中國古典小說乃至中國傳統文學觀的影響），但所記軼事仍多少透露出知識分子面對新時代潮流的思考或態度，如西學知識、國民教育、宗教信仰等面向，不可輕易忽視。

除前舉〈第十 樟腦殺蛹〉介紹新知外，如〈第十九 賤女篤志〉敘及愛知縣欲建學於吉田，起初當地富豪無人響應，而一矮女子，竟捐出所蓄金五圓，拋磚引玉，而遠近傳為美談，最終成就美事。又〈第十六 奇童感親〉則寫庶民之子，雖家境清寒，亦不斷求學之志，文末更以「縣令聞之，謂：『僻陋有此等兒，是國家之福也。』上陳文部省述其狀云」（頁 117）作結，在此雖可視為「據實直敘」的表現，卻也從側面顯示對國民教育的看重，呼應明治四年（1871）設立文部省，明治五年（1872）頒布《學制》，劃分學區並廣設小學，推動教育機會均等，主張「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的時代課題。

另有〈第十二 女子勸學〉：

²⁴ 孫虎堂：《日本漢文小說研究》，頁 123。

我邦風俗，不論都鄙女孩兒六七歲以上，耍戲常為雛偶戲，衣箱什器，俎刀釜鬻類，皆縮至數寸，將矮小屏風圍住，排設陳列，呼姊呼妹，或權擬老爺，擬老孃，細截菜根，搏丸沙土，擬酒餚，擬飯菜，笑娛終日，父母看以為常，無知有所謂學問者。……又有一奇女子係橫濱醫人武田悌堂女孫，本年十六歲，玉眸花臉，素工絲竹，亟被女師稱嘆。十三歲，慨然奮志，厭棄絲竹，去就文學，師事米國平文先生妻某氏學習英語，又兼妙繪事。客歲徵任東京女學助教，嘗謂女子青年幾時，我未堪為人師，願得良師事之，或不負此生矣。想今都會女子幼做雛偶戲，稍長搽粉點朱，只管磨得頭面光滑，做將來高，便擇富室子弟，勾引誘惑，卑便賣淫鬻情，取一場快活，何等醜態，聞箇樣奇女子生在同時，豈不愧死乎！（頁 117）

此則實際提及三位女子好學之事，而其中又屬武田悌堂孫女之例較為特殊，竟「慨然奮志，厭棄絲竹，去就文學」，且「學習英語，又兼妙繪事」。對此，作者更於開頭強調本邦不重女子教育的舊俗，以此突顯女子發憤向學之奇，並於文末與現今都會女子只顧「搽粉點朱」而「勾引誘惑」富家子弟的醜態，進行對比，有所褒貶。

或針對宗教信仰之風，作者於記事之餘，亦藉機有所評論：

窮境僻陬，多無醫藥，巫祝乘之，動稱符水，誑惑愚俗。偶有得驗者，狡猾之徒倣之，詐偽百出。愚氓惑不悟，宿疾垂死，卻醫不藥；得一掬腐水，以為千金之賜，千拜萬謝飲之，疾益甚以死，猶不自悟，親戚傷之，鄉黨悼之，皆道：「那廝沒造化，神乎雖靈，莫奈之何。」嗚呼！愚之難曉，一至此乎！……由是觀之，世之神供符水可知矣。（〈第二十三 奇驗惑人〉，頁 126）

夫死生大事也，彼二人者夷然踏之，蓋有死樂於生者也。輪迴之說，因果之論，浮屠氏喜道之，彼誤信焉，以輕死耳。嗚呼！教之惑人亦甚矣哉！（〈第二十五 墨水情死〉，頁 127）

首則論及窮鄉僻里「多無醫藥，巫祝乘之，動稱符水，誑惑愚俗」的迷信現象，

並感嘆「愚之難曉，一至此乎」，故藉事例以曉喻，可謂具有新聞紙般開導民智的用意。次則記東京一對男女郎才女貌，卻因女方父母反對其婚事，最終共同選擇殉情而死的事件，而於文末批評佛家「輪迴之說」、「因果之論」的感人甚深。

雖說上舉之例於全書所占比重不高，但足以證明其思想內容，已多少帶有文明開化的思維與色彩。其實，活躍於明治初期的漢文小說家，昔日深受江戶儒學的習染，然維新以來，他們轉而處於人人暢談西學之利，漢學由盛而衰的時代，卻仍然堅持以漢文書寫向來被視為「小道」的稗史小說，藉由載錄歷史人事，或彰揚東洋道德，或感嘆時世變遷，或批評社會百態，或展現個人才學，或追求風雅情致，或自嘲時不我予等等，實際是面對新時代的挑戰下，一種維護優良文化傳統的姿態。²⁵誠如《當世新話》第二則〈利島風俗〉記載漁夫新八於明治七年（1874），因漁船遭遇暴風，漂流至利島（伊豆諸島之一）的相關見聞，文末謂「其深摯懇篤過都人遠矣」（頁108）。針對此則，學海批曰：「自當世間化者流言之，不免為野蠻，然淳樸之風殊覺可慕，不謂狡詐世界猶有此等境界，吾將泛海從之」（頁108），以利島人之淳樸對比都會人之狡詐，加之本書收束於〈第三十一 騙拐奇術〉、〈第三十二 賊妓攫金〉、〈第三十三 囤貨賺金〉等唯利是圖、偷盜騙拐的情事，其間似乎前後呼應，寄託作家彰揚舊有美德、回歸淳樸世道的意圖。

循此，足以論斷《當世新話》的作者——依田學海，亦是處於新、舊時代下，東、西文化衝突間的一份子，以其舊有的漢學素養，結合新興行業的新聞資訊，致力於記述社會百態與市井民情，藉此反映相關社會問題，揭露一味追求「全盤西化」的不良後果。

²⁵ 學者曾言：「明治初期的文壇即處於洋學取代漢學而成為顯學的轉換期，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民權運動與實用功利的經世思想正席捲全國，而江戶時代獨霸的儒家思想以及漢籍則被視為不合時流。……漢詩及漢文的寫作風氣並不受崇拜西洋文明熱潮影響而趨消沈，反而文人們透過漢詩文作品來反映他們對江戶優美文化傳統的禮贊，這群自命為前朝遺老，對江戶幕府具有好感，不肯認同明治政府的西化政策，積極以創作漢文作品來表示對膚淺的崇洋風氣有所不滿和批評，漢文體小說正好也在這一時期源源不斷出現，顯然與上述背景有密切關係。」見李進益：〈論明治時期漢文小說產生的背景——兼論與中國清代小說的關係〉，《天理大學學報》第183輯（1996年9月），頁2。此外，筆者亦針對明治漢文小說家，以漢文記錄世變，言志抒情，藉此維護文化傳統之意涵，有所論析，詳參拙著：《日本明治時期漢文小說書寫之漢學淵源——以文言小說為例》，頁146-154。

四、《當世新話》之史傳表現

大體而言，中國筆記體小說深受史傳文學的影響，崇實而抑虛，多標榜其記事確實，秉持史家態度，而篇幅短小，基本上是一事一記，對人物性格著墨較少，在敘事上追求沖淡簡約的風格。如孫虎堂指出《當世新話》「語體上為淺顯的文言，在文體上絕大多數可認定接近於筆記體小說」²⁶，而作者既然採用「筆記體」形式，自然會沿襲相關的形式結構或寫作技巧，並追求類同於此文體的功用價值，尤其是呈現出對於中國史官精神的認同與依附。例如「筆記體」小說形式靈活，不拘一格，有時隨聞而記，未必分門別類，而《當世新話》以〈橋氏計法〉列於首則，似頗有發明其源自新聞的真實性，絕不同於傳統街談巷議般「虛實參半」性質的意味，進而彰顯是著的實錄價值。再者，對照半醉居士〈當世新話序〉所認同的稗史小說為「據實直敘，隨聞即錄」、「要是眼前實事」、「審其顛末，證其事實」，不僅呼應中國的稗史小說觀，並以此昭示《當世新話》「補史之闕」、「裨補世教」的功用與價值，更是對其書寫特色的準確掌握。²⁷

（一）史家筆法之模仿

中國史傳向來強調「實錄」原則，小說家既為「稗史」之流，往往以此標準自我要求，強調故事來源有所根據，不敢謬言。《當世新話》作者對此傳統亦有所承襲，積極運用史家筆法，遵循「據實直敘」的原則，一再強調所記人事的真實性，如明確交代人物姓名、籍貫、身世與事件的時空。誠如前述，作者記事好稱「本年」（即明治七年），而三十三則逸事中即有二十四則明載年代，如：

明治六年，祖父八十二，祖母八十七，氣力未衰，蓋夫妻孝養之厚所致云。事聞縣廳，賞賜若干。（〈第五 陸中孝子〉，頁111）

²⁶ 孫虎堂：《日本漢文小說研究》，頁123。

²⁷ 如呂玉華：《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發展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6年）指出「稗史從其名稱來看，自然也是史之苗裔，但在具體使用中更多地凸現了與史乘的差異。這個概念的使用，充分說明了理論家們的命名嘗試，更能突出小說依附史傳的自覺主動性，故他們對於稗官、稗史總是從勸誡、補史角度進行論述，並經常和野史、野乘等並列使用」，見頁51。因此，半醉居士論及「稗史小說之體有二」，或強調其「勸誡」、「補史」的價值，乃至於依附史傳的特質，實是基於吸收中國古代相關小說觀念，依此準則發揮而成。

今得一人，名呼做梅，原是茨城縣常陸國太田村農安治女，本年十八歲，幼妙詞曲，容貌絕麗，以孝聞。（〈第十五 貞妓全產〉，頁 119）

本年三月十五日，家貓被鄰人所畜貓嚙殆死，雌狗聞其聲奔往救之，家貓為免。（〈第十八 義狗救貓〉，頁 121）

鸞月、阿仙、笠松、阿松等女賊著名，院本曲子間巷常道之，然要不過稗官者流，架空之談耳。獨日本橋北兩替街歌妓阿玉竊盜一案，現是本年七月事。（〈第三十二 賊妓攫金，頁 132〉）

無論是寫孝子善養祖父母，孝女為家貧而請入妓籍，抑或雌狗奔救家貓，歌妓竊取客人財物，均明載事發時間，甚至是人物當下年齡，亦有所提及。

由於筆記體小說多半來自「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干寶〈搜神記序〉），隨筆雜記而成，記事往往具有片斷性。相較之下，《當世新話》雖同具「粗陳梗概」的特質，卻極為留意故事結局的交代，即善者受官府褒揚，惡者受法律制裁，可謂有頭有尾，而此既為強調有憑有據的記實筆法，亦是儒家勸懲觀念的展現。如：

有事類前章父殺其子者，係小田縣備後國品治郡新山村農忠右衛門事。……事遂發覺，被縛，坐門歐殺人後下手，理直者懲役十年，是同年十二月事。（〈第四 誤殺二命〉，頁 109、110）

千葉縣廳之災在本年二月三日，不知何故。未幾，發覺主名本縣試補官永田方容被縛，承招明白。……或疑方容在京時，費資甚洪，薄俸之吏何從得之。縣使人探信，盡得其實，遂就縛。所費猶餘二百餘金，藏在小蝶處，皆見追徵。（〈第二十八 贓吏就縛〉，頁 129）

驅役女子教賣淫鬻媚者，昔時妓院行徑，今日禁遏，然猶私窠子一種未得盡力一掃，更將女子做囤貨騙詐妓家者，騙中之最奇最幻也。本所松倉街有塚本清次者，本年二十八歲，不事生產，常做不依本分買賣，自道：

「竊盜未免幾分危懼，更尋一件奇計。」……居月餘，遂被捕縛，坐騙詐取金，贓金現金及衣服等價直計百廿五圓，懲役十年。玻璃拐帶贓金五十九圓，以從，故減一等，懲役百日。騙拐之術愈出愈奇矣。（〈第三十三 囤貨賺金〉，頁 133）

〈第四 誤殺二命〉寫農民忠右與所休之妻爭吵，失手誤殺妻兒，東窗事發後獲罪；〈第二十八 贓吏就縛〉記吏員方容與酒樓之妓小蝶狎暱，為贖其身，盜用公款，且為湮滅證據，甚至放火焚燒縣廳，但終究難逃法網；〈第三十三 囤貨賺金〉則敘清次口齒伶俐，反應機靈，與女子玻璃聯手，四處詐騙妓院，而向來以「驅役女子教賣淫鬻媚」的妓院，竟遭佯裝自願為妓之人所騙，更突顯當世的騙拐奇術。

再者，中國自古有史論傳統，以此展現史家的個人色彩，如司馬遷《史記》即繼承先秦史書（以《左傳》為代表）之「君子曰」的論贊形式，創立「太史公曰」並確立後代「論贊」體例的史學批評模式。此種崇尚議論的風氣，亦影響至「史之餘」的中國文言小說，如唐傳奇中可見篇末模仿史傳論贊的形式，表達作者見解，猶如宋代趙彥衛《雲麓漫鈔》所謂「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云云；而清代蒲松齡《聊齋》「異史氏曰」，更是其中突出之例。

對此，《當世新話》雖未採用史家「論贊」體例，於文末進行作者自評，但其中仍有以第三人稱客觀敘述的方式，針對所記人事，發揮議論，傳達見解。如上引〈第十二 女子勸學〉、〈第二十三 奇驗感人〉、〈第二十五 墨水情死〉之例皆可見，另有：

頃聞備中國上房郡川西村有義牛救主事。世有看其主濱危，恬不之救，反乘機計利者。嗚呼！斯人乎！可以媿義牛矣。（〈第十三 義牛救主〉，頁 118）

本年三月十一日，有節婦玖邇自殺代夫事。……嗚呼！世運污下，風俗澆薄，死節如此，婦能有幾人乎！（〈第二十一 節婦殉義〉，頁 123、124）

豪富之家爭一錢，卑賤之夫讓十圓，既已奇矣，乃至被詈不怒與受勞不

謝，何其懸隔之甚也。（〈第二十七 車夫讓金〉，頁 129）

首例以農民八郎耕作時，慘遭豪豬攻擊，抵擋不住，而家牛竟奮勇救主事，指責世上見主臨危而不救，竟「乘機計利」者，實不如一牲畜，其中恐怕是眼見幕末變局下的有感而發。次例寫東京士族諏訪部敬定繼室玖邇，為夫君因家貧而盜竊恩人錢財之舉，自殺謝罪，並以「節婦」稱之，感嘆「世運污下，風俗澆薄」。末例記車夫（人力車）的廉潔，載客收費而多得十圓金，不敢私藏而特地返還，卻遭舖管之詈事。作者藉由兩人的對比，點出富者的高傲與貪心，並讚揚車夫的廉潔，可謂高下立判。

透過上舉數例，印證《當世新話》與中國史傳文學的血脈淵源，基於「史貴於文」的傳統觀念，在形式結構與寫作手法上，頗向史傳散文借鑑的痕跡，一如中國文言小說的書寫傳統。

（二）實錄精神之發揮

猶如〈當世新話序〉曰：

政事之得失，制度之沿革，諸司百僚之賢愚不肖，兵馬錢糧之贏絀多寡，及外國交際之親疏，內地衰旺之利害，官有外史之職，院有歷史之課，網羅而蒐收之，所以有編年記傳之史體也。若夫孝子貞婦義僕節婢之逸事，劇盜騙拐妓女俳優之情狀，可笑可驚，可泣可怒，可以為模楷者有焉，可以為鑒戒者有焉，而皆官吏所不暇載也。若以其瑣事鄙屑不足錄，一切抹殺之，則何以得察閭巷之情態、民間之風俗哉！是稗史小說之所以不可已也。（頁 103）

半醉居士從正史與稗史小說的差異入手，指出史書的宏大敘事，關注於牽動歷史發展的關鍵人事，瑣碎、鄙俗者自然為「官吏之所不暇載也」，進而強調稗史小說「自成一家」的存在價值。循此，稗史小說之所以得察「閭巷之情態、民間之風俗」，尚得依靠文人的「據實直敘」，載錄民間「可以為模楷者」、「可以為鑒戒者」，故其言仍是中國傳統小說「補史」觀念的繼承。

然而，由於中國稗史小說不乏「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

目之所親聞睹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干寶〈搜神記序〉)，或如《四庫全書總目》針對唐人康駢《劇談錄》亦云：「然稗官所述，半出傳聞，真偽互陳，其風自古，未可全以為據，亦未可全以為誣，在讀者考證其得失耳。」²⁸今以〈當世新話序〉中「顧但龐雜濫汜，或失於訛傳，或過於浮誇，若有識者參伍考證，取其瑜而去其瑕，舉其可信，而舍其可疑，未必不為察風觀俗之一助也」之言，兩相比對，可見半醉居士對於中國稗史小說「未可全以為據，亦未可全以為誣」的文體性質²⁹，有著相當清楚的認知。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當世新話》毫無虛構性，或是缺乏對小說藝術價值的認識，即〈當世新話序〉中亦云：

所憾朝報告單，雜載不倫，使覽者漫然一讀，遂為覆醬之用，而並彼為模楷、為鑒戒者棄之，豈不可惜乎！……余受而閱之，皆現今實事，一披讀之間，或笑或泣，或罵或怒，其敘事精細，描景靈活，雖身臨其地而目見其狀者，未能得如此之詳也。於是乎嚮之棄為覆醬者，面目一變，將以有傳乎後世焉。(頁 103)

上文指出新聞紙雖「據實直敘」，但內容多屬「朝報告單，雜載不倫」，經過作者的鑄裁，令讀者「一披讀之間，或笑或泣，或罵或怒」，即表達對小說審美作用的關注。至於所謂「敘事精細，描景靈活」之特色，是否適切，姑且不論，但以為有此前提，方能吸引讀者，進而達到勸懲、鑑戒的教育作用。

有鑑於半醉居士認同的稗史小說是「雖不無一二粉飾，要是眼前實事」，批評的是「架空設事，假造人物」，即是強調題材基於現實人事，追求「據實直敘」，

²⁸ 王雲五主持：《合印四庫全書總目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3冊，頁81。

²⁹ 有學者針對古人所謂「筆記體小說」的基本文體觀念，進行梳理，概括為以載錄鬼神怪異與歷史人物軼聞瑣事為主的取材觀念及題材類型意識，包括博物體、志怪雜記體、瑣言體、瑣聞雜記體等內部諸多題材類型觀念；「史之末流」以及「未可全以為據，亦未可全以為誣」的文體性質認知與「據見聞實錄」的寫作原則界定；以「游心寓目」、「廣見聞」、「助談柄」為主而兼「寓勸誡」、「補史之闕」的功用價值定位，可為比較的參照。見王慶華：〈論「筆記體小說」之基本文體觀念〉，《浙江學刊》2011年第3期，頁116-121。

卻未反對「一二粉飾」，而為小說敘事的虛構性，留下些許餘地。對此，孫虎堂指出「這類篇章的題材一般是由假名寫成的新聞報導，所以作者在用漢文撰寫這類敘事作品時，不可避免地經過了一個『轉譯→重現』的過程，換句話說，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和情節雖然襲自原作，但文本面貌與具體場景的營構已經過作者相當程度地發揮，從而使之具備了小說的文體特徵」³⁰，既說明作者「增飾」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也點出箇中關鍵。尤其，衡之於明治政府對於報紙言論有所管制，如明治二年（1869）「新聞紙印行條例」中明文規定「一切天變地異、物價、商法、政法（不許妄加批評）、軍事（其說錯誤而不改者有責）、火災、嫁娶、生死、學藝、遊宴會、衣服、飲食、諸種官報、洋書譯文、海外雜話，凡事無害者均可登載」³¹，即禁止妄加批評國事。相較之下，若是將時事改寫成漢文小說，作為一種文學文本，自然較為允許夾帶作者個人的思考與批判，即以中國稗史之筆，記敘當代人事，並有所論斷與寄託，進而成為反映明治時代部分知識分子思想縮影的重要媒介。

綜上所述，已大致釐清《當世新話》以模仿中國文言小說為基調，採用「筆記體」形式，借鑑中國史傳精神，強調實錄原則，並運用史家筆法，記述當今人事，描繪世態人情，因而帶有史傳色彩的書寫特色。再者，明治時期西方科技的積極引進，尤其是「電信機」³²的出現，使訊息迅速流通，無遠弗屆，加上新聞業的勃興，足以即時掌握社會奇聞與海外要事，亦避免傳統稗史傳訛失實的可能性，而對於小說的取材，提供了莫大的助益。《當世新話》正是順應此一時代潮流，首部專門取材自新聞，發揮中國史家實錄精神，強調即時性事件的筆記體漢文小

³⁰ 孫虎堂：《日本漢文小說研究》，頁123。

³¹ 參見〔日〕伊藤正德：《新聞五十年史》（東京：鱒書房，1943年），頁49。

³² 或作「傳信機」。新政府招聘英國技師為顧問，於明治二年（1869）在東京與橫濱間架設電線，展開近代電信事業發展的新頁，而如此便利的新科技，亦成為當時作家關注的新事物。如菊池三溪《西京傳新記》之題名，即立足於中、日使用漢字的共同點上，以同音異義詞之理，發揮巧思。所謂「故不知者，誤認以曰電信機。蓋以傳新記之與電信機，音相似故焉耳」（〈西京傳新記二編序〉），因「傳新記」與「電信機」二詞的日語發音相同（皆為でんしんき），既以電信機之發達，昭示明治新時代的來臨；亦藉此記錄作者眼見的新奇事物，以嚮後世讀者。另如服部撫松《東京新繁昌記》（五編）〈築地電信局〉亦載云：「政廳先變動之未起，預知遐域之事情；商電及郵船之未發，既問海外之物價。其他至瑣細裨益，不遑枚舉，是所以於萬國交際，不可無電信之設也。我國始架電線於東京與橫濱之間，以築地為其心軸。現今則交通於官省，遂蔓延於國內。」見〔日〕服部誠一：《東京新繁昌記》（五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明治七年東京奎章閣本），頁2。

說集，故有其不容忽視的開創性。

五、結語

日本在江戶、明治時期大量湧現漢文小說作品，而身為日本人要使用漢文進行寫作，非得具備相當程度的漢學素養不可。其實，日本漢文小說作為古代東亞漢字文化圈的珍貴遺產，其與中國文學的關連，往往不僅限於形式結構與題材內容的借鑑與模仿，更有著對稗史小說的創作與批評，以及其所涵括的文化淵源的學習與受容，值得吾人深入探究。

今以《當世新話》為研究對象，剖析作者取材自新聞而著重於描寫庶民世相的題材特徵，並基於近代新聞業勃興的背景，借鑑中國史傳精神，強調實錄原則，模仿史家筆法，撰述此稗史之作。尤其，小說家猶如記者之姿，以舊有的漢文小說傳統，結合嶄新的新聞資訊，得以避免傳訛失實，發揮史傳實錄的最大價值，既展現與其他作品的不同之處，更是時代變遷下的一種新嘗試。又附帶一提，本書題材的世俗化，或是語言上參雜些許白話（尤其以人物對話中較多見，可謂刻意模仿之跡），甚至於〈第二十二 白川疑獄〉中出現「話分兩頭」（頁 124）之套語，而有鑑於江戶時代以來明清白話小說已大量傳入日本，甚至出現採用「話本體」、「章回體」形式的日本漢文小說，自然不能忽視作家亦向白話小說借鑑的事實，但因非本文設定主題所在，故未深入研探。

最末借平山果、宮內貫一所編《日本開化詩》卷之上有詩云：

世態人情渾熟諳，品評作意戒淫耽。文華燦爛縱橫筆，寫出百般好話談。

（〈新聞〉其一）

任非卑劣責非輕，懲戒陋風勸善行。一自新聞行此地，坐知天下一般情。

（〈新聞〉其二）³³

從此二詩不難看出當時漢詩人對於「新聞」的認知與期待，既要「世態人情渾熟

³³ [日] 齋田作樂解說：《東京寫真鏡他全七種》（《開化風俗漢詩集》2）（東京：太平書屋，2010年），頁 316。

諳」，講究題材的現實性與普遍性；亦或「文華燦爛縱橫筆，寫出百般好話談」，關注其文學性與趣味性；更追求「任非卑劣責非輕，懲戒陋風勸善行」，強調文章的勸懲功能與作家的社會責任。

如此言論，移之於評論取材自新聞時事的《當世新話》，亦可相當程度代表其書寫特色與價值理念，而兩者差異主要在於語言上的和、漢之別，且足以昭示明治漢文小說創作與近代報刊發展的互動關係。

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王三慶等主編：《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

王雲五主持：《合印四庫全書總目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日〕服部誠一：《東京新繁昌記》（初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明治七年東京奎章閣本）。

〔日〕服部誠一：《東京新繁昌記》（五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明治七年東京奎章閣本）。

〔日〕菊池純：《西京傳新記》（二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明治八年京都文石堂本）。

〔日〕齋田作樂解說：《東京寫真鏡他全七種》（《開化風俗漢詩集》2），東京：太平書屋，2010年。

二、近人論著

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

呂玉華：《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發展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6年。

倪愛珍：《史傳與中國文學敘事傳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高文漢：《日本近代漢文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

孫虎堂：《日本漢文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新北：志一出版社，1995年。

陳水逢：《日本文明開化史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

- 〔日〕秋山勇造：《明治のジャーナリズム精神 幕末・明治の新聞事情》，東京：五月書房，2002年。
- 〔日〕日野龍夫等校注：《開化風俗誌集》（《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明治編1》），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
- 〔日〕伊藤正徳：《新聞五十年史》，東京：鱒書房，1943年。
- 〔日〕猪口篤志：《日本漢文學史》，東京：角川書店，1984年。
- 〔日〕木下彪：《明治詩話》，東京：岩波書店，2015年。
- 〔日〕前田愛：《幕末・維新时期文學 成島柳北》（《前田愛著作集》第1卷），東京：筑摩書房，1989年。

三、期刊論文

- 王慶華：〈論「筆記體小說」之基本文體觀念〉，《浙江學刊》2011年第3期。
- 向沖：〈試論筆記體小說的敘事方式〉，《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年第5期。
- 李進益：〈論明治時期漢文小說產生的背景——兼論與中國清代小說的關係〉，《天理大學學報》第183輯，1996年9月。
- 楊爽：〈漢文白話體小說の書き手「秋風道人」とは誰か：依田學海の創作活動の一面〉，《二松學舎大學人文論叢》第99輯，2017年10月，頁138-151。
- 〔日〕高橋昭男：〈《新柳情譜》——成島柳北の風流韻事〉，《成蹊國文》第49號，2016年3月。

四、會議論文集

-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域外漢文小說論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
- 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編印：《文學絲路——中華文化與世界漢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世界華文作家協會，1998年。
- 〔日〕磯部彰編：《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ほしづくよ》，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アジア・アフリカ學術基盤形成事業「東アジア出版文化國際研究據點形成及びアジア研究者育成事業」チーム，2010年。

五、學位論文

柯混瀚：《日本明治時期漢文小說書寫之漢學淵源——以文言小說為例》，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

六、網路資源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国立国会図書館サーチ」

<http://iss.ndl.go.jp/>

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

<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index.html>

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明治期出版広告データベース」

http://base1.nijl.ac.jp/infolib/meta_pub/G0037150meijisub



